

元朝秘史

(校勘本)

烏蘭校勘

中華書局

元朝秘史

(校勘本)

烏蘭校勘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元朝秘史:校勘本/烏蘭校勘.-北京:中華書局,2012.7
ISBN 978-7-101-08793-2

I.元… II.烏… III.蒙古族-民族歷史-中國-元代
IV.K28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48304 號

責任編輯:李 靜

元朝秘史(校勘本)

烏 蘭 校 勘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台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

920×1250 毫米 1/16·28½ 印張·4 插頁·40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126.00 元

ISBN 978-7-101-08793-2

前言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學文獻，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經過長期廣泛的、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元朝秘史》已經成爲一個國際性的學術領域，形成了專門的學科「《秘史》學」。目前，關乎《元朝秘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涉及歷史、語言、文學、宗教、社會學等諸多領域。其中，文獻學方面的研究開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績較大，受關注的程度也較高。即使如此，《元朝秘史》文獻學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繼續擴展和深入的空間。一方面，由於《元朝秘史》本身形式的特殊性以及相關記載的複雜性，給文獻學方面的研究帶來了較大的難度。儘管一些問題隨着研究的深入逐漸趨向明朗，但是還沒有達到徹底解決的地步，有些問題因資料所限可能會長期處於推測的狀態。例如對原書作者、成書確切年份等問題的探討。另一方面，隨着研究環境的逐步改善，以往無法開展或無法較爲充分開展的研究可以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例如對原文的全面校勘等工作。

作爲此次校勘本的前言，旨在於前人研究成果^(一)的基礎上，就《元朝秘史》文獻學研究方面的情况做一番大致的梳理，盡量使相關問題呈現出比較清晰的輪廓和脈絡，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瞭解、利用《元朝秘史》。

(一) 文獻解題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那珂通世的《元朝秘史》日文譯注本《成吉思汗實錄》（東京，一九〇七年）序論、陳垣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初於一九三四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雕版印行，後收入《勵耘五種》，再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洪煊蓮（William Hung）的《〈蒙古秘史〉源流考》（*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ZAS*（《哈佛亞洲雜誌》）十四，一九五一年）、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東京，一九五四年）、柯立夫（F.W.Cleaves）的英譯本《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導論、亦鄰真（Y. Irinchin）的《〈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Monggol-un Niyuca Tobciyan, sergügelte, Öbör Monggol-un Yekke Surayuli-yin Keblel-un Qoriya*, 1987）緒論《〈元朝秘史〉及其復原》、甄金（Jingjin）《蒙古秘史學概論》（內蒙古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白·特木爾巴根（B. Temurbayana）《〈蒙古秘史〉文獻版本研究》（*Monggol-un Niyuca Tobciyan-u Surbulji Bičig Bar Keblel-un Sudulul, Öbör Monggol-un Suryan Kömüjil-un Keblel-un Qoriya*, 2004）、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蒙古秘史·13世紀蒙古史詩編年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rill, 2004）導論等。

一、《元朝秘史》的形式以及內容、結構

《元朝秘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漢字史籍」^(一)。所謂「特殊形式」，指的是這部書的完整形式^(二)是由正文、旁譯、總譯三部分組成的，其中正文是用漢字音寫的蒙古語，正文右側逐詞注有漢譯即旁譯，每隔一段長短不一的內容後附有漢文縮譯即總譯。每一個這樣的單元稱為「節」，全書共分為二百八十二個節。節、總譯的叫法，是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萬光泰提出的^(三)。

《元朝秘史》之所以採用這樣一種特殊形式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出於為漢人編譯蒙古語教材的目的。明初，明廷為了培養漢蒙翻譯人員，令翰林院編寫《華夷譯語》，「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四)。《元朝秘史》的完成時間亦在明初，形式也與《華夷譯語》相近^(五)，其編譯目的和性質當與《華夷譯語》同。

《元朝秘史》原文所使用的文字，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是畏吾體蒙古文。畏吾體蒙古文的原文已經散佚，流傳下來的祇是根據原文用漢文做成的教材，即這部題名為《元朝秘史》的書。把蒙古語原文作為正文，採用漢字音寫，是為了漢人學習蒙古語的發音。旁邊加注漢譯，是為了學習者掌握蒙古語的詞義，旁譯當中還以特定用字表示蒙古語數、格、時制、語態、人稱變位等特徵，是為了便於學習者正確理解文中的語法現象。總譯採用通順的漢語翻譯，是為了方便人們對該段原文的內容有一個總的瞭解。

(一) 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緒論。

(二) 針對《連筠篲叢書》僅收總譯部分的本子，內藤湖南《蒙文元朝秘史》，載《史學雜誌》第十三編第三號，一九〇三年；王國維《蒙文元朝秘史跋》，收入《觀堂集林》第一六卷，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第二冊，第七六五頁）等人稱三部分齊全的本子為「蒙文元朝秘史」。

(三) 萬光泰《元秘史略》（《史料叢編》，廣文書局，一九六八年，第一葉）序文謂：「《元秘史》，十卷，續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文用蒙古語一行，譯語一行，每節次後又用總譯一段連貫其語。每行當別有蒙古字，今不存矣。」

(四)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六二年，第五冊，第二二三—二三四頁。

(五) 《華夷譯語》（甲種本）包括詞彙集和來文集兩部分，來文集部分共十二份，以每份來文為單位，正文用漢字音寫蒙古語原文，其右側逐詞注有漢語旁譯，其中五件來文每句之後附有全句漢譯文。本文利用版本為栗林均編《華夷譯語》（甲種本）蒙古語全單詞·詞尾索引》（日本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二〇〇三年）所收《涵芬樓秘笈》第四集影明洪武刊本。

《元朝秘史》的內容主要可以分爲三大部分，即成吉思汗先人的世系譜、成吉思汗的生平史、窩闊台的簡史。結合節的劃分，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部分（§§1~58）：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兒帖·赤那至其父也速該·把阿秃兒以來的世系譜（摻有個別史事的簡述）：

第二部分（§§59~268）：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

第三部分（§§269~281）：窩闊台即位後的簡史（未提及他的去世）。
跋文（§282）。

目前流行的諸版本，分爲十二卷本、十五卷本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的本子，總的內容一樣，節的劃分亦同，祇是分卷不同。十二卷是最初的劃分，十五卷的劃分是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出現的。

現存十二卷本總共六百零八葉，平均每卷五十葉左右^{（一）}。

十二卷本具體分卷情況：

正集

- 第一卷： §§ 1~68 （四十九葉）
- 第二卷： §§ 69~103 （五十一葉）
- 第三卷： §§ 104~126 （五十一葉）
- 第四卷： §§ 127~147 （五十一葉）
- 第五卷： §§ 148~169 （五十一葉）
- 第六卷： §§ 170~185 （五十四葉）
- 第七卷： §§ 186~197 （五〇葉）
- 第八卷： §§ 198~208 （四十九葉）
- 第九卷： §§ 209~229 （四十九葉）
- 第十卷： §§ 230~246 （四十五葉）

（一）從明洪武年間刻本到他所見抄本，十二卷本的版式基本相同，皆因採用了影抄的形式。

續集

第一卷： §§ 247~264 (五十一葉)

第二卷： §§ 265~282 (五十六葉)

現存十五卷本的版式不盡相同，葉數因此亦有不同，但是分卷原則一致。
十五卷本具體分卷情況：

第一卷： §§ 1~68

第二卷： §§ 69~96

第三卷： §§ 97~118

第四卷： §§ 119~140

第五卷： §§ 141~153

第六卷： §§ 154~169

第七卷： §§ 170~185

第八卷： §§ 186~197

第九卷： §§ 198~207

第十卷： §§ 208~224

第十一卷： §§ 225~238

第十二卷： §§ 239~246

第十三卷： §§ 247~264

第十四卷： §§ 265~276

第十五卷： §§ 277~282

二、《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

關於《元朝秘史》成書年代的探討，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涉及現存漢籍《元朝秘史》的完成時間，另一個涉及這一漢籍所據畏吾體蒙古文原文的完成時間。

(一)《元朝秘史》所據原文的寫作年代

現存《元朝秘史》卷尾第282節是跋文，總譯謂：「此書，大聚會着，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刺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這裏給出的「鼠兒年七月」，應該視為《元朝秘史》所據畏吾體蒙古文原文寫作完成的時間。但是，這一「鼠兒年」到底應該推算為哪一年呢？學術界至今仍然存在着幾種不同的看法，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六種。

甲，一二二八戊子年說

這一說法的基本觀點是，「鼠兒年」指一二二八戊子年，在這一年先寫成了《元朝秘史》前面的大部分內容，卷末的一少部分內容是後來續寫的，而本為前一部分內容所做的跋文後來被移到了新的卷尾。丁謙首先提出該書於戊子年寫畢，書成後又附入太宗朝內容的說法⁽¹⁾。植村清二、李蓋提(L. Ligeti)、德福(G. Doerfer)、羅依果、拉赤涅夫斯基(P. Ratchevsky)、村上正二、亦鄰真、甄金、姚大力等人支持這種看法，其中植村清二首先指出補入續寫內容後將尾跋後移的問題⁽²⁾。還有其他一些學者後來改變了自己先前的看

(1) 丁謙《元秘史地理考證》(卷一五，第四葉上)說：「是此卷所記太宗事實，必成書後始附入之。」其附錄《元秘史作者人名考》(第二葉上)說：「又案《秘史》末條，明言大聚會着，鼠兒年寫畢。鼠兒年戊子也。元太祖歿於丁亥，次年大會諸王公，議立新君，書即成於是年。」
(2) 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一九〇五年。

(二) 植村清二《元朝秘史》小記(載《東方學》第十卷，一九五五年)說：「《秘史》的現在這個樣子，未必是原本的形式，跋文本來是在別的地方的……是在正集末尾的，也許是後來在某個時機(或者像小林博士所說的是在整理補綴未曾整理的片段記述時)，將其移到續集的末尾了。」李蓋提《蒙古秘史》(A mongolok tikos története, Budapest, 1962, pp. 210—213)、德福《蒙古秘史》成書年代(Zur Datierung der Geheimen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ZDMG (德國東方協會雜誌) 113, 1963年)、羅依果《論〈蒙古秘史〉的成書年代》(Some Remarks on the Dating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 14, 1965年)、《蒙古秘史》13世紀蒙古史詩編年史導論(XXXIII)：拉赤涅夫斯基《失吉忽禿忽》12—13世紀蒙古的一位親信(Šigi-quutuqu, ein mongolischer Gefolgsmann im 12.-13. Jahrhundert, CAJ (中亞雜誌) 10, 1965年)、村上正二《蒙古秘史》成吉思汗故事第三冊(東京，一九七六年，第三七八頁)：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緒論，第八三頁。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第七三一—七五頁。姚大力《成吉思汗》還是「成吉思汗」——

法，轉而支持丁謙等人的觀點，如小林高四郎、柯立夫、克勞森（G. Clauson）、蒙庫耶夫（Н.П. Мункуев）、小澤重男、嘎丹巴（Ш.Гадамба）、鄂嫩（У.Онон）等人⁽¹⁾。對於《元朝秘史》後一部分內容的完成時間，學者之間意見不盡相同。對於前後兩個部分的劃分，有按卷劃分的，也有按節劃分的。李蓋提、羅依果、村上正二、亦鄰真等人按節劃分，以第1~268節為主要部分，以第269~281節為續寫的部分。

這一觀點反映出相關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階段性的深入，結論似乎更為接近實情。將一二二八戊子年視為該書主要部分的完成時間，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符合跋文中所說時間、地點、事件內容之條件要素的，祇有一二二八戊子年。《元朝秘史》第269節記載：「成吉思既崩，鼠兒年，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秃，左手大王幹赤斤，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並萬戶、千戶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刺勒地行大聚會着，依成吉思遺命立幹歌歹做皇帝。……」第269節的記載與跋文的內容實相呼應⁽¹⁾。羅桑丹津（Blo bsang

兼論《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問題》，載《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一) 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第六章《元朝秘史》成書年代，東京，一九五四年，第二〇三、二〇四頁。據羅依果《蒙古秘史，13世紀蒙古史詩編年史》導論（1xxxv），柯立夫在一九六二年時認為「鼠兒年」是一二四〇年，到一九六六年他致函羅依果表示贊同其關於一二二八年的說法。柯立夫在其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蒙古秘史》英譯本中的「鼠兒年」之後注一二二八年。克勞森《三份蒙古文注解》（Three Mongolian Notes, *Collectanea 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Prof. Dr. Rintchen*（《蒙古學叢書》），Wiesbaden, 1966）。蒙庫耶夫《巴拉第和〈蒙古秘史〉幾個問題的考察》（П.И. Кафаров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Тай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ов），載霍赫洛夫（А.Н. Кохлов）編《巴拉第及其對祖國東方學的貢獻，紀念其逝世一百周年文集》（П.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79）。嘎丹巴《蒙古秘史》（*Mongol-un Niyuṣa Tobčiγul*,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0, pp. 415—416）。小澤重男《元朝秘史》日譯本，東京，一九九四年，第一〇五—一二一頁；鄂嫩《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生平和時代》（*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nggis Khan*, Curzon Press, Richmond, Surrey, 2001, p. 173）。

(二) 《聖武親征錄》（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正中書局，一九六二年，第二〇一頁）；《元史》（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第二卷，第二九頁）；《史集》（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漢譯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第二卷，第三〇頁）；記窩闊台於一二二九年（己丑、牛兒年）在大忽里台上被推戴為大汗。但是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濟漢譯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上册，第二一四—二一七頁）；《蒙古源流》（海涅士編《薩岡徹辰〈諸汗源流寶史〉》，薩岡徹辰蒙古歷史著作的庫倫手抄本），*Sayang Sečen, Qad-un Öndisün-i Eerdeni-yin Tobči. Eine Urga-Handschrift des mongolischen Geschichtswerks von Sečen Sagang (alias Saṅgag Sečen)*, Berlin, 1955, 42v）同《元朝秘史》一樣，亦記窩闊台於戊子年（一二二八）即位。對《聖武親征錄》、《元史》、《史集》所記成吉思汗去世後第一次大忽里台召開的時間，還有必要進一步審視。《聖武親征錄》載：「戊子。……秋，太宗皇帝自虎八會於先太祖之太宮。」《金史》（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卷一五「完顏奴申傳」載：「正大五年（一二二八）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大夫，奉使大元。至龍駒河，朝見太宗皇帝。」或許說明窩闊台一二二八年在聚會之後就留在了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所在地。小林高四郎、植村清二、亦鄰真、羅依果等人傾向認可《元朝秘史》的相關記載。

bstan gin)《黃金史》⁽¹⁾間接收錄的《元朝秘史》的內容，也止於第268節，這有助於說明《元朝秘史》第1~268節原本就是自成一書的，書後有跋文。還有十二卷本的「正集」、「續集」的安排，看來也不是隨意劃分的，「正集」基本上就是第一、二部分的内容，「續集」基本上是第三部分的内容。由於後來續加内容制成新書，原有跋文就被後移至新成之書的末尾，成了現在的282節。那麼，以第268節為劃分前後兩部分的界綫，也應該是合理的。祇是，從現存《元朝秘史》包含個別一二四〇年以後的史事以及所反映出的畏吾體蒙古文的成熟程度來分析，其所據原文不會是一次完成的，形成初稿後應該經歷了不止一次的修改和重新抄寫。

乙，一二四〇庚子年說

持這一說法的的學者比較多，且多數為研究早期的學者。例如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李文田’、那珂通世、伯希和(P. Pelliot)‘柯津’(С.А.Козин)‘海涅士’(E. Haenisch)‘小林高四郎’、達木丁蘇隆(С. Дамдинсүрэн)‘田清波’(A. Mostaert)‘巴雅爾’(Bayar)等人⁽¹⁾。這一觀點的主要依據是：窩闊台一二四一年去世，而該書沒有提到他的去世，他在位期間的鼠年祇有一二四〇庚子年。

丙，一二五二壬子年說

(一) 羅桑丹津《簡述古昔諸汗禮制諸作黃金史》，影印本，烏蘭巴托，一九九〇年(Eten-ü Qad-uṅ Öndüsilgesen Törö Yosun-u Jokiyal-i Tobčilan Qutuyusan Altan Tobčī Ketekī Orošibai, Ulaanbaatur, 1990)。

(11) 巴拉第《關於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傳說》(Старинное монголь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Том IV, 1866, p. 258)；李文田《元朝秘史注》(《漸西村舍匯刻》，一八九六年，卷一五，第十葉上)；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第六七一頁；伯希和《〈蒙古秘史〉原文中的兩處脫文》(Deux lacunes dans le texte Mongol actuel de l'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JA (《亞洲雜誌》) 二二二，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第一一二頁)；柯津《秘密故事，1240年蒙古編年史》，原名蒙古秘史·元朝秘史》(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240г.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Монгол-ун нуруча тобчиуан. Юань Чжао Би Ши. 1941, pp. 17—18, 199)；海涅士《蒙古秘史》，1240年寫於客魯漣河闊迭額島的一件蒙古文稿，萊比錫，一九四一年(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Aus einer mongolischen Niederschrift des Jahres 1240 von der Insel Kode'e im Kerulen-Fluß erstmalig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Leipzig, 1941, p. 148)；小林高四郎《蒙古秘史》日文譯注本(東京，一九四一年，第三二二頁)；達木丁蘇隆《蒙古秘史》(Mongol-ün Nuruča Tobčiyān, Ulaanbaatur, 1947, p. 280)；巴雅爾《蒙古秘史》(Mongol-ün Nuruča Tobčiyān, I-II, Öbör Mongol-ün Atad-ün Kεblεl-ün Qortu, 1980, I, pp. 17, 89)；據羅依果《蒙古秘史，13世紀蒙古史詩編年史》導論(XXX, LXXXIV)，田清波傾向於一二四〇年說。另外，韓泰華舊藏本、陸心源舊藏本、丁丙舊藏本在第十五卷最後一節總譯第一行葉眉都寫有「太宗十二年庚子」的字樣。當出自鮑廷博的眉批。

持這一說法的學者有格魯塞（R. Grousset）、余大鈞等人^(一)。格魯塞認為該書突出了拖雷，有暗示汗位將由窩闊台系轉到拖雷系的描寫（§ 225），這祇是在蒙哥登上汗位後才有可能。余大鈞認為根據中外史料分析，一二五一辛亥年夏六月至一二五二壬子年春季召開了推戴蒙哥為大汗的大忽里台，並議決懲辦、處置窩闊台、察合台兩系宗王及其黨羽，其後不久該書寫成。因此書中存在不少美化蒙哥之父拖雷、貶低窩闊台和察合台等人的描寫情節。近來，美國學者阿特伍德（C. P. Atwood）撰文支持此說，主要從分析原文內容結構入手，認為一二五二年最為合適^(二)。陳得芝也根據程鉅夫《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的一段記載，認為確有一二五二年夏在客魯漣河大會諸王之事，可知推蒙哥即位的大聚會從一二五一年夏斷斷續續延至一二五二年之夏，因此他贊成《元朝秘史》成書於一二五二年的看法^(三)。

丁，一二六四甲子年說

持這一說法的學者主要有洪煨蓮、韋利（A. Waley）、列亞德（G. Ledyard）^(四)。洪煨蓮認為第247節出現的「宣德府」一名能够證明該書寫於一二六四年，因為宣德府在一二六二年才由「宣德州」改名而來。

戊，一二七六丙子年說

持這一說法的學者主要是姚從吾和札奇斯欽（Jagchid Sechen）^(五)。他們根據第247節出現的另一地名「東昌」，認為該書應當寫於一二七六年，因為這一年東昌之地才定名。

己，一二二四甲子年說

持這一說法的學者是岡田英弘^(六)。他認為跋文中提到的「大聚會」是指為推舉泰定帝也孫帖木兒即位

(一) 格魯塞《蒙古帝國》（*L'Empire Mongol*, E. De Boccard, 1941, pp. 230, 303）；余大鈞《〈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載《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二) 阿特伍德《〈蒙古秘史〉成書時間再考》（*The Date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Reconsidered*, *JSYS*（《宋元研究雜誌》）三十七，二〇〇七年）。

(三) 陳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載《中華文史論叢》二〇一〇年第一期。

(四) 洪煨蓮《〈蒙古秘史〉源流考》；韋利《〈元朝秘史〉札記》（*Notes on the Yuan-ch'ao pi-shih*, *BSOAS*（《東方與非洲學學校通報》）三十三，一九六〇年），列亞德《蒙古征高麗與〈蒙古秘史〉的成書時間》（*The Mongol Campaigns in Korea and the Dating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A*（《中亞雜誌》）九，一九六四年）。

(五) 姚從吾、札奇斯欽《漢字蒙古音〈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一九六〇—一九六二年。

(六) 岡田英弘《〈元朝秘史〉的成立》，載《東洋學報》六六，一九八五年。

而於一三三三年召開的大忽里台，次年《元朝秘史》寫成。

然而，史書中并未見到有關一二四〇年或一二五二年、一二六四年、一三二四年召開過大忽里台（也客·忽鄰勒塔 yekelurita，即「大聚會」）的確切記載。其他論據也存在各自的問題⁽¹⁾。因此，以上這些年份的推定還都難以令人徹底信服。

（二）特殊形式漢籍《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

《元朝秘史》的原文，本為蒙元時期宮廷用畏吾體蒙古文所修「脫卜赤顏」即「國史」的一部分。脫卜赤顏從蒙古汗國時期開始修纂，中間可能一度輟修，不過還是至少修到了元文宗朝⁽²⁾，成吉思汗和窩闊台的歷史是其中最前面的部分，屬於早期脫卜赤顏。脫卜赤顏是皇家秘籍，被深藏宮中，外人不得窺見⁽³⁾。

元朝在中原的統治結束之後，脫卜赤顏落入明人手中。其面臨的命運，依目前的一般看法是，當時爲了在漢人中培養蒙古語的翻譯人才（通事、譯字生），將元代脫卜赤顏中成吉思汗和窩闊台的事迹部分選作教材進行加工，製成了一部特殊形式的漢籍，即經過漢字音寫原文、加注旁譯和總譯、題寫書名，形成了現在的《元朝秘史》。

關於這項工程完成的時間，《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條有相關記載：

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

（一）據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緒論）分析，與《元朝秘史》相應之處，《聖武親征錄》、《元史》「太祖本紀」亦作「宣德府」，因此還不能輕易判定《元朝秘史》的記載有誤。而《元朝秘史》此處的「東昌」是一個訛文，有羅桑丹津《黃金史》、《聖武親征錄》、《金史》、《元史》、《史集》的「東京」（Dongjing）爲證。

（二）《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載：「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迹。」同書卷一五「世祖本紀二」載：「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同書卷三六「文宗本紀五」載：「命朵來續爲蒙古脫卜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從之。」同書「虞集傳」又載：「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

（三）《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載：「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許有壬《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并序》（《圭塘小稿》）卷十，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雍正二年抄本，第七葉下）載：「……國史曰脫卜赤顏，至秘也。」孫承澤《元朝典故編年考》（文海出版社，影印清鈔本，第四八七頁，第九卷）說：「元人有《秘史》……書藏禁中不傳。」

器用，靡不俱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

據此，《元朝秘史》至少應該完成於一三八二年（洪武十五年）之前，也就是在明初的一三六八年至一三八二年之間。

然而，從《華夷譯語》和現存《元朝秘史》的實際情況來看，前者在音譯用字等方面不如後者成熟、講究，後者當中可偶見一些前者的用字特例，因此有人分析《元朝秘史》的翻譯完成是在《華夷譯語》編成之後^(一)。《華夷譯語》現存最早刻本是一三八九年（洪武二十二年）刊行的（據序言），現存《元朝秘史》刻本殘葉顯示它與《華夷譯語》刻本的某些特徵相近，刻成的時間當與《華夷譯語》刻本同時或稍晚^(二)。儘管可能出現多種不同的推測^(三)，但是總的來說，將《元朝秘史》的完成限定在明初的洪武年間（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是沒有問題的。

三、《元朝秘史》的書名

目前，該書除「元朝秘史」外，還有「元秘史」、「蒙古秘史」兩種名稱。為何會出現三種不同的書名，還需要具體考察分析。

（一）「元秘史」和「元朝秘史」的得名

有情況顯示「元秘史」是明初漢字加工本最初的書名。前引《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條

（一）陳垣《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說：「今以譯音用字及伯之改罷，兒之加舌，丁之改勒諸節觀之，則《元秘史》之譯，尚在《華夷譯語》後。」
（二）陳垣《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說：「……內閣大庫故紙堆中發見《華夷譯語》與《元朝秘史》殘頁……洪武槧本也。《華夷譯語》洪武二十二年刊本……有刻匠姓名，蓋《華夷譯語》之元始槧本也。而新發見之《元朝秘史》，板式與《華夷譯語》無異，其刻匠二十七人中，尚有姓名與《華夷譯語》相同者周文名、趙丙二人，其板刻之先後，相距不能過遠。」
（三）例如，洪煥蓮《〈蒙古秘史〉源流考》推測《元朝秘史》的翻譯始於洪武初年，在編寫《華夷譯語》之前，或許已經存在一種行間附有漢文轉寫的畏吾兒字抄本和一種僅有總譯的抄本，到《華夷譯語》編成後，又出現了刪畏吾兒字原文、改進旁譯用字的本子。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第七章《〈元朝秘史〉漢字音譯的年代》推測《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條所提「元秘史」不一定是指明初漢譯的《元秘史》，可能是指元代的脫卜赤顏即秘史，因為「秘史」之名已見於元代文獻。

提到的書名為「元秘史」，而出現在明洪武年間刻本殘葉版心的書名也是「元秘史」^(一)。

目前所見多數十五卷本卷首（包括各卷卷首）均題「元朝秘史」^(二)，十五卷本出自《永樂大典》所收抄本，而《永樂大典》本又抄自洪武刻本。

因此一般推測該特殊形式的漢籍起初定名為「元秘史」，後來抄入《永樂大典》時改為「元朝秘史」。

因目前的通行本四部叢刊三編本是據顧廣圻校本影印的，書名乃據其卷首題名題為「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又多題「元朝秘史」，「元朝秘史」遂成為該書的一般用名。

（二）「蒙古秘史」的得名

顧廣圻校本流傳較廣，影響較大。其卷首題名「元朝秘史」下方以小字所寫「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幾個字，也較早受到人們的注意。據顧廣圻的跋文，底本即張祥雲藏「影元槧舊鈔本」中已有這幾個字。但是他誤以為這幾個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三)。那珂通世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成吉思汗實錄》的序論中，正確地將「忙豁侖紐察脫察安」解釋為蒙古語「蒙古秘史」的音譯^(四)。忙豁侖紐察脫察安，是蒙古語 *Monggol-un ni uca to[b]ča'an* 的漢字音譯，直譯即「蒙古的秘密國史」。後來的人據此譯為「蒙古秘史」。另一書名「蒙古秘史」由此而來。

那麼，「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幾個字為何以小字書寫，而且附於卷首漢語書名之下呢？它與漢語書名「元秘史」（或「元朝秘史」）是何種關係呢？目前學術界存在幾種看法，主要有以下四種。

（一）洪武刻本已佚，殘葉中無卷首及分卷卷首之葉，無從獲知卷首題名詳情。據報道，馬玉堂舊藏本卷首識語提到「元刻本……每卷第一行元秘史三字大書佔二行」。見白·特木爾巴根《馬玉堂的〈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載《內蒙古師大學報》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所謂「元刻本」即原刻本之義，當指明洪武刻本。據此可知洪武刻本每卷卷首題名亦作「元秘史」。顧校本無版心和欄格，四部叢刊三編本影印顧校本時為其補加版心和欄格，版心內補寫「元秘史」書名。當據明洪武刻本版式而為。

（二）陳垣《元秘史譯音用字考》提到的內閣大庫原藏永樂二年總譯抄本，屬十二卷本，但是卷首也題「元朝秘史」。此抄本與《永樂大典》本基本同時，書名已改為「元朝秘史」，但是分卷未改。

（三）目前所見大多數本子中，還有韓泰華舊藏本和孫星衍舊藏本在卷首有這一蒙古語題名，但是韓泰華舊藏本訛「紐察」為「組察」。另據介紹，馬玉堂本卷首亦有這一蒙古語題名，識語也誤以為「即注書人姓名也」。見白·特木爾巴根《馬玉堂的〈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

（四）錢大昕在一八〇〇年成書的《補元史藝文志》（《叢書集成初編》，第十二冊，第十九頁）中曾懷疑到《秘史》即元代國史「脫必赤顏」。幾乎與那珂通世同時，沈曾植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在完成於一九〇五年左右的《元秘史補注》（一九四五年正式出版，收入《敬躋堂叢書》）中解讀這八個字，認為「即《元朝秘史》蒙文也」。到一九二五年，王國維在《蒙文元朝秘史跋》中也重申了類似觀點。

甲，「忙豁侖紐察脫察安」是該書原文的書名，製作漢字本時被譯為「元朝秘史」（或「元秘史」）^(一)。
乙，該書原本本無書名，明初製作漢字本時題蒙古語書名，漢字音寫為「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又漢譯為正式書名「元朝秘史」^(二)。

丙，「元朝秘史」是明人加上去的，又被返譯成蒙古名，用漢字音寫為「忙豁侖紐察脫察安」^(三)。

丁，明初製作漢字本時題「元秘史」，並用漢字音寫其對應名為「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四)。

根據各方面情况分析，明初節選元代「脫卜赤顏」中前兩汗的事迹部分製作漢字本時，考慮到新成之書已是漢籍，故正式書名題漢語書名「元秘史」，大字題寫，然後又返譯成蒙古名，因為漢字本的製作者清楚原文來自「脫卜赤顏」，遂返譯為「忙豁侖紐察脫察安」，並以漢字音寫，小字標注於正式書名下方。

（三）《元朝秘史》所據原文的名稱

《元朝秘史》所據畏吾體蒙古文的原文即元代的「脫卜赤顏」已經失傳，無從考查各汗事迹部分的具體名稱。不過，元代文獻在提到「脫卜赤顏」時，往往單獨說「脫卜赤顏」，偶爾說「蒙古脫卜赤顏」。十七世紀羅桑丹津間接收入脫卜赤顏中成吉思汗事迹（約相當於《元朝秘史》三分之二的內容）的史籍，書名的核心部分為 Altan Tobči（黃金國史—黃金史）。再聯想十四世紀初伊利汗國拉施都丁之《史集》的情況，其中提到汗廷金匱中的《阿勒壇迭卜帖兒》（Altan Deber），即「黃金史冊—金冊」。從這些相關情况分析，「脫卜赤顏」可能沒有什麼更具體、固定的名稱，如果有，很可能是稱為「阿勒壇脫卜赤顏」（Altan Tobčiyan），即「黃金國史」。Altan Tobčiyan 可以理解為「黃金家族的史書」，即皇家史乘^(五)。

十二卷本中的一個現象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即卷首第一行題名「元朝秘史」，次行單獨出現「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旁譯「名皇帝的根源」）幾個字，下文另起行。於是人們推測第二行這幾個字與書名有關。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第一卷將「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譯為「成吉思合罕之根源」，

（一）例如，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第一卷，第一頁；甄金《蒙古秘史學概論》，第十二頁，等。

（二）例如，余大鈞《蒙古秘史》（漢譯本），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序言第二頁。

（三）例如，海涅士《蒙古秘史》德文譯注本序言；洪煊蓮《〈蒙古秘史〉源流考》；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緒論。

（四）例如，羅依果《蒙古秘史，13世紀蒙古的史詩編年史》導論（xlv）。

（五）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緒論說：「當時的蒙古汗廷已經把黃金同皇家聯繫起來，黃金家族、黃金生命、黃金門檻、黃金纜繩等都是皇家御用的專詞。明代蒙古史書不止一部稱《黃金史》，大概就是沿襲了古老的傳統。」

單佔一行，用句號隔開。後來石濱純太郎提出「成吉思汗源流」（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是今本《元朝秘史》正集的書名，「蒙古秘史」是加入續集後的全書的名稱^(二)。小林高四郎贊同石濱純太郎關於「成吉思汗源流」為《元朝秘史》正集書名的推測^(三)。洪煥蓮認為「成吉思汗的根源」是全書原來的名稱^(四)。亦鄰真認為「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祇相當於《元朝秘史》第一—二節的文字，即成吉思汗的傳說始祖以來的二十二代家譜，不牽涉更多的內容^(五)。羅依果認為「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是最初的名稱，既指成吉思汗祖先世系的部分，也用作全書的名稱，後來經過修訂（主要在忽必烈朝）成「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六)。這些觀點的一致處，在於都以「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為畏吾體蒙古文原文的名稱，不同點在於將其囊括的範圍有所區別。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不以「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為書名，而認為是卷首第一句話的主語，祇不過出於元代行文體例而被斷行^(六)。

四、《元朝秘史》的作者

原書跋文中沒有給出作者的姓名，正文裏也看不到有關作者的直接信息。長期以來，人們關於作者是誰所展開的種種猜測一直不斷。

一八〇五年，顧廣圻在顧校本的跋文中說卷首標題下的「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幾個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顧廣圻這一誤解的影響其後在中國學者中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先後為李文田、葉德輝等人所沿

(一) 石濱純太郎《〈元朝秘史〉考》，載《龍谷史壇》三十五，一九三五年。

(二) 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第一五六頁。

(三) 洪煥蓮《〈蒙古秘史〉源流考》。

(四) 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緒論將「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漢譯為「成吉思汗的家世」，即「成吉思汗的家族世系」。如果以「成吉思汗罕訥忽札兀兒」為獨立的單位，那麼從蒙古語 *Engke* 的詞義理解，以及從《元朝秘史》的內容結構分析，將其限定為《元朝秘史》第一—二節的題目還是比較合適的。

(五) 羅依果《蒙古秘史，十三世紀蒙古史詩編年史》導論 (xi-xiii)。

(六) 方齡貴《關於〈元朝秘史〉書名問題之再探討》，載《蒙古史研究》第八輯，二〇〇五年。

襲^(一)。二十世紀初，那珂通世、沈曾植分別指出這幾個字是「蒙古秘史」的音譯，顧廣圻誤解的影響才告一段落。

目前學術界已經出現的猜測，主要可以分爲五類。

甲，塔塔統阿說

金井保三認爲現存《元朝秘史》的底本是由曾在乃蠻部任文臣的畏吾兒人塔塔統阿等人用蒙古語記寫的^(二)。

乙，失吉忽秃忽說

首先提出這一推測的是海涅士，他認爲作者應該是宮廷中少數有教養的、識字的蒙古人之一，或許就是成吉思汗的養弟、國家的最高斷事官失吉忽秃忽。普哈（P. Poucha）、拉赤涅夫斯基也推測是失吉忽秃忽。羅依果先前認爲《元朝秘史》可能是合作寫成的，後來傾向作者是失吉忽秃忽的說法^(三)。

丙，鎮海說

植村清二認爲作者應該是占據相當高位的人物，而鎮海做過必闡赤、札哩赤，掌管詔敕和其他重要文書，儘管不敢確定他就是撰寫者，但是他是更符合條件的人。巴雅爾認爲鎮海是撰寫《元朝秘史》工作的領導，參與者還有怯烈哥、薛徹兀兒等人^(四)。

丁，蒙力克說

喬瑪（Ш. Чоймаа）注意到《元朝秘史》時常出現以第一人稱敘述的現象，認爲作者當中應該有與成吉思汗家族關係非常親密的人，而蒙力克具備這方面的條件，無疑是參與講述史事的耆老中的爲首之人^(五)。

（一）李文田在《元朝秘史注》卷首說：「按忙豁侖，即蒙古氏也。紐察其名，或與脫察安同撰此史，或紐察乃脫察安祖父之名。」葉德輝在《元朝秘史》觀古堂刻本的序言中說：「卷首標題下分注二行，左爲忙豁侖紐察五字，右爲脫察安三字，猶存撰書人名銜。」

（二）金井保三《〈元朝秘史〉漢譯年代補考》，載《東洋學報》第一卷第三號，一九一一年。

（三）海涅士《蒙古秘史》德文譯注本序言（xiv）；普哈《作爲史料和古典文學名著的〈蒙古秘史〉》（Die Geheimen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als geschichtliche und literarische Denkmäler, Prag, 1956）；拉赤涅夫斯基《失吉忽秃忽，12—13世紀蒙古的一位親信》；羅依果《〈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述評》，《蒙古秘史》，13世紀蒙古史詩編年史》導論（xxix）。

（四）植村清二《〈元朝秘史〉小記》；巴雅爾《〈蒙古秘史〉上冊，代前言〈關於〈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譯者〉》。

（五）喬瑪《關於考證〈蒙古秘史〉作者的問題》（Монголын Нууц Товчооны Зохиолчийг Топруулах Асуудал, Mongolian Studies 2, 1994）。